

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

王小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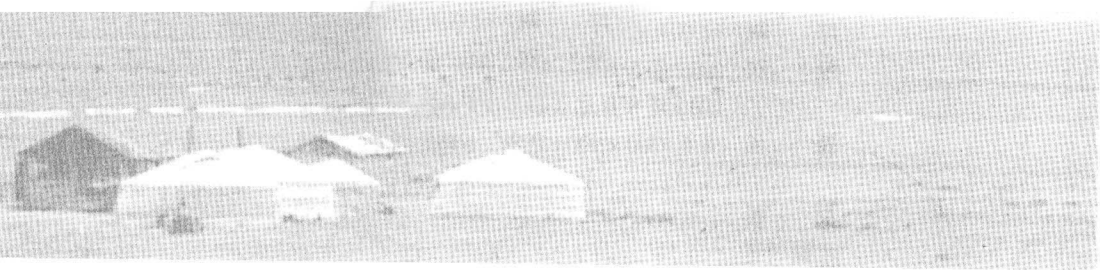
ZHONGGUO ZHONGGU DE ZUQUN NINGJU



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

王小甫◎著

ZHONGGUO ZHONGGU DE ZUQUN NINGJ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王小甫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2.8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ISBN 978-7-101-08802-1

I. 中… II. 王… III. 中华民族-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古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1946 号

书 名	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
著 者	王小甫
丛 书 名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责任编辑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¼ 插页 2 字数 336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802 - 1
定 价	56.00 元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二〇一〇年五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邓小南

副 主 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 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 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帆(北京大学历史系)

前言

本书是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批准号:02JAZJD770002)的最终成果之一。书名题为“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可以说如实反映了项目计划建议书本来想要达成的研究目的。我的想法是:

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历史,就空间范畴而言,实际上大多研究的是今日中国的历史状况,而不是所谓“历史上的中国”。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中国有一个发展过程。秦统一以前,中国曾长期存在一种宗法制共和国体。有学者指出:“‘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已经用得很普遍了。‘国’(繁体字作‘國’)与‘或’相通,指的是城邑。春秋以前,大大小小的国数以千百计,于是天子所居的‘国’(京师)就被称为‘中国’,即处于中枢地位的国。以后又将地理上处于中心区的国称为‘中国’,即中心区的国。这一中心区开始只限于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即周天子的直属区和诸侯中的晋、郑、宋、鲁、卫等国,而周围地区或其他诸侯国就不能算中国。”^①秦始皇统一六

^① 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页。

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国体,天子所居“中国”就成了帝国的代名词;所谓“天下”在政治层面也是天子所宅,等同“中国”,其意指大一统的帝国疆域,不包括此外的“绝域”^①。

虽然过去传统习惯将中原王朝称为中国,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有中原王朝^②。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今日中国继承了历史上在这块地域上活动过的许多族群及其政权的遗产,这些族群有的延续至今,成为今日中国众多族群人群之一;还有很多早就不存在了,甚至早在今日中国形成之前很久就已成了历史遗迹,这些遗迹陈陈相因,全都成了我们今天的历史遗产。对这一历史和这些历史遗产进行研究,成为今天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是他们的后人,对于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我们首先有责任进行研究。所以,对今日中国空间范围内历史上曾经活动过的所有族群、政权进行研究,当仁不让地属于我们的任务。

因此,本书的研究就不能限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内^③。在本书研究时间范围内存在和活动过的族群和政权,无论当时他们是否认同中国,凡是与今日中国的地域空间有关^④,全都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本书所谓“中国中古的

① 参《新唐书·西域传》赞,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264页。

② 唐初修正史,南朝梁、陈,北朝周、齐,各列其书。蒙元王朝修正史,同时修了辽、宋、金三部。今人研究,只能尊重历史。

③ 中国历史上不乏多个政权、王朝同时认同中国的时代,例如魏晋南北朝以及辽宋夏金时期。如姚大力先生所指出:“处于分裂时期的各国自身,往往都自称正统、自称‘中国’,把对方看作是自己实现统一的对象。”(见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67页)

④ 所谓“有关”,是因为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变化,今日中国的疆域不能完全反映“历史时期的中国”的空间地域,所以,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提出:“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收入氏著《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页)本书处理中国中古历史涉及空间范围,和谭先生处理历史地理问题的意见基本一致,差别只在我们把“历史”延续到了今天。

多元文化环境”，正是指这一在时间延续上的空间多样性，它们构成的历史对于今日中国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阶段。显然，这并非要否定历史上的中国。恰恰相反，在这样一个理念和前提下，研究中古时期周边族群的凝聚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就成了认识历史中国（中原王朝和认同中国的其他王朝、政权）的题中之义和重要任务之一。

众所周知，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个成员共同参与创造的，各族群都为中华文明的发达进步做出过自己积极的贡献，并经过长期发展在多元一体格局中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凝聚核心。中古时期（3 至 14 世纪）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阶段。这一历史时期始自秦汉古代帝国结束，终于明朝建立和早期近代文明的萌芽发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中世纪。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周边尤其是北方族群特别活跃，对中国社会的演进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六国时代“五胡乱华”、北朝时期鲜卑入主、五代诸朝三为沙陀、辽金与两宋的对峙，这些史实自不待言；即使是统一强大的隋唐王朝，学界公认其繁盛得益于诸多族群的参与甚至域外文明的影响；元朝更是由少数族人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声威远播欧亚。北方族群的积极活动，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整合，推动国家统一不断发展壮大；处于社会发展上升阶段的塞外族群进入中原，对中原社会造成极大冲击，带动了皇权回归，促进了社会转型。可见，相对于中原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凝聚核心，周边诸族尤其北方族群的活动为中国中古历史构造了多元文化环境，从而使中国社会演进获得了适当的必要条件。

迄至世纪之交，学界对于上述历史状况研究的趋向大致是：或者做断代或分时段研究，或者做北方民族或北族王朝研究，这些研究中又以做关系史居多。然而，断代或分段研究很难通贯看出中国中古这持续千余年长时段的特点和共性；只研究民族史或民族关系史实际上又很难真正跳出传统史学的窠臼，因而不能融会贯通，把北族活动作为多元文化环境纳入整体中国史进行研究。对于长时段总体史的研究来说，即使是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

“唐宋变革”等讨论,也多局限于中原地区与前后不同王朝统治时期的比较,而未能将中国中古的社会全貌纳入视野。

有鉴于此,本书力求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的视角,把族群活动和不同文化作为多元环境成分纳入整体中国史进行研究;在中国3至14世纪整体发展的背景下观察周边族群的勃兴,将当时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纳入视野,分别专题,深入探究,总体考察,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

基于以上宗旨,本书写作在尽量占有相关文献资料的同时,注重出土文物材料,并进行实地田野考察,以便能使书面知识更加生动,使平面的叙述能够立体化,对有关历史进行更为具体的观察,以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到内蒙古、山西、东北地区乃至蒙古国进行过多次各种类型的考察^①,由此在实地场景下激发学术灵感,引出了更具理解力的见识。

本书还试图借鉴和利用国内外较新的学术理论和方法,结合课题实际加以运用,希望能够取得突破。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理论:提倡问题意识,开展跨学科研究,注重长时段、大空间、多层次相联系的总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把握与认识。此外,陈寅恪先生的文化史观,近年兴起的政治文化研究,社会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历史社会学的结构分析理论,比较方法,以及后现代思维等,也都是作者所感兴趣的,希望用这些影响自己的研究,尽可能给本书增添一些新意。

本书正文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共五章,选取典型个案重点研究中国中古周边族群勃兴的原因,主要是观念转化(信仰改宗)对族群凝聚的作用;第二部分即本书“后论”,集中以唐五代北方及西北沿边地区的族群活动与族际关系为例,讨论中古周边族群与中原社会互为关联和相互影响,主要是

^① 具体可参考本项目中期成果:论文集《中国中古的族群关系——文化、文献和野外考察》(待出版)。

周边族群活动与传统国家体制(帝国的政治体系)的关系,试图从这样一个侧面考察中国中古的政治转型。本书是想以“文化认同与政治整合”为主题,重点揭示中国中古历史的两个方面,一是各族群为限定资源分享范围以主观认同(想象)凝聚起来的过程,一是族群间为争取资源或参与共享而改变想象(历史记忆)实现整合的过程。我以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即族群认同在空间上的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依其重点不同,也大致表现为族群认同过程在时间上的先后阶段。因此,本书的篇章基本按这种时空逻辑安排,论述也大致遵循同样的内在逻辑——由族群认同到国家(多族群民族,中央集权国体)认同的历史演进。与以往研究明显不同的是,我虽然承认体质、语言、习俗等客观、自然因素对族群凝聚的构建意义^①,但本书的研究更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与演进,因而特别关注族群凝聚中主观与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实际上(包括历史上)并不受体质、语言、习俗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这一点可能差近陈寅恪先生所谓“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②之意。

本书附录还收了作者近年文章8篇,分量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些文章有的内容涉及边疆史地和族群文化,于阅读本书正文时可资参考;还有的讨论地区关系与文化交流,将其收入本书,是希望有助于读者扩展思考,理解在东亚地区认同中国与否,其历史进程也不相同。总之,本书力求在强调文化环境影响的同时,深入揭示中原与周边交互作用的进程,以期突破传统史学(华夷观、目的论和决定论等)的窠臼,客观展现中国中古社会的全貌,说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① 传统民族学长期以来十分强调客观、自然因素对于族群区分的意义,无论这种观念的时代背景如何,其实人类大概自进入历史就离开了自然存在状态,作为社会存在状态的人群或族群不可能是完全自然的,所谓客观、自然因素很可能只是族群以外的他者的主观想象。实际上,同种族、语言范围内的人群划分,以及跨种族、语言的族群认同在历史上、在现实世界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② 陈寅恪认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见氏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0页。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突厥与拜火教	(1)
第一节 拜火教与突厥之兴	(2)
第二节 拜火教传入突厥的条件	(7)
第三节 关于阙特勤	(29)
小 结	(36)
第二章 吐蕃与本教	(37)
第一节 本教传入的时间	(38)
第二节 松赞干布时代的政治文化	(45)
第三节 本教传入吐蕃的路线问题	(57)
小 结	(74)
第三章 回鹘与摩尼教	(76)
第一节 改宗前的回纥政治史	(77)
第二节 牟羽可汗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89)

第三节	回纥之改宗摩尼及相关时空问题	(104)
小 结		(115)
第四章	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	(118)
第一节	阿保机的即位问题和降生神话	(120)
第二节	木叶山地望与“青牛白马”说	(127)
第三节	燔柴、祭东及其他	(137)
第四节	关于述律氏	(146)
小 结		(151)
第五章	蒙古崛起与政治文化	(153)
第一节	成吉思汗始祖传说的性质	(154)
第二节	蒙古民间宗教里的波斯因素	(159)
第三节	成吉思汗的“善法”	(174)
小 结		(179)
后 论	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	(181)
第一节	“逐水草而居”再认识	(184)
第二节	外蕃:社会演进的环境条件	(187)
第三节	安西都护——外蕃与内蕃之间	(192)
第四节	熟蕃的地位与演变	(199)
第五节	族际流动与国家认同	(203)
结 语		(207)
附 录		(210)
(壹)	由草原突厥石人看东西文化交流	(210)
第一节	突厥石人的艺术特点	(210)
第二节	拜火教斗战神形象的演化流变	(213)
第三节	石人造型与古突厥政治文化	(217)

第四节 石人手持物的时空文化关联	(221)
(貳)封常清伐大勃律之路	(229)
第一节 锡亚琴(Siachen Glacier)之路	(230)
第二节 封常清讨击的前进营地	(234)
第三节 封常清进军的路线问题	(238)
结 语	(244)
(叁)2004 年暑期大同考察所得	(246)
第一节 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佛前菩萨之 垂翼白马牲灵座	(246)
第二节 浑源圆觉寺塔座下层砖雕波斯风格动物咬啮纹	(248)
第三节 燕云十六州的地区差别	(250)
第四节 山西北部的内外分野	(251)
(肆)隋唐五代河套的交通与交流	(252)
第一节 古代交通	(253)
第二节 文化交流	(256)
第三节 文化特征与时代精神	(261)
(伍)汉唐中日关系与唐代东亚新格局的形成	(262)
第一节 汉唐之际的东亚国际关系	(262)
第二节 迄至“白江口之战”(663)以前的东亚政局	(266)
第三节 新罗统一对东亚政局的影响	(269)
第四节 渤海国建立与东亚地区新格局形成	(276)
(陆)如何看待日本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的成就	(283)
(柒)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291)
第一节 高句丽南部地区的历史归属	(292)
第二节 新罗的统一目标	(294)
第三节 新罗与唐朝辽东地区的关系	(298)
余 论	(302)

(捌)中韩关系视野下的《三国史记》撰作 (304)

 第一节 韩中史料相辅相成 (305)

 第二节 以汉文音写保存古语资料 (307)

 第三节 厘清易于混淆的历史概念 (308)

 结 语 (310)

参考文献 (312)

第一章 突厥与拜火教

中国政治传统有所谓“正统性”问题，其实就是有关政权易手及统治合法性的一套话语。社会文化尽管不同，权力的合法性总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德运”、“气数”、“符瑞”、“天道”等多种说法。显然，在传统社会，君权神(天)授是最便于利用也是最有力的革命舆论，即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有关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这些传统，近年学界已有很好的研究^①。本书以下各章着重讨论中古时期周边族群的相关问题。本书所讨论的这些例证显示，尽管中国中古各族群的政体形式不尽相同，其合法性层次也不同，但在政权易手之际，很多都伴随有历史文化变革——在周边族群主要表现为新宗教的传入和改宗。而在传统社会，宗教的传播又往往与商业活动的开展同时并进^②。

① 如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正统问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列入本项目中期成果：论文集《中国中古的族群关系——文化、文献和野外考察》（待出版）。

② 参季羨林《商人与佛教》，收入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91—207页；并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50—252页。

第一节 拜火教与突厥之兴

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本“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552年破茹茹(即柔然)建国。近代学者研究,汉文“突厥”是突厥语 Türk 的复数 Türküt 的对音,单数 Türk 则音译为汉文“铁勒”^①。显然,突厥和铁勒原本并无二致,铁勒是古代操突厥语人群的一种泛称。那么,由专名突厥所代表的族群是怎样从一般的铁勒人中区别出来的呢?换言之,突厥凭什么能从铁勒人中兴起成为北方草原的统治人群呢?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改宗了新的宗教(此处指拜火教),从而突破了旧的社会传统,获得了族群凝聚的新的精神力量^②。关于这一点,在史料记载有关突厥起源的各种传说中都有反映。《北史·突厥传》记载了突厥起源的三种传说:①狼生、②平凉杂胡、③神女之子。我们以下稍微做点分析:

学界对第②种即“平凉杂胡”说讨论较多,一般都认为这反映了粟特人早期与突厥人的密切关系,甚至是一种混生融合状态(mixed milieu),以及粟特商人在突厥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③。与第③种传说有关,戈登(Peter B. Golden)研究了大部分早期突厥可汗的名称,发现几乎全都不是突厥语^④。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显然是较早的母系社会里,一个首领——纳都六

① 见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冯承钧汉译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48页。并请参《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铁勒”、“突厥”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422.424—425页;戈登《突厥族群史导论》,115—117页。本书称引资料之版权信息,详见全书最后《参考文献》。

② 可参考[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七章《政治权威的崛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106—107页;[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54、92、94、98、304等页;[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导读”9—10页。

③ 参见魏义天《粟特商人史》(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James Ward,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5),204—206页;戈登《突厥族群史导论》,120—122页。

④ 见戈登《突厥族群史导论》,121—122页。

设是从外部引进的。统治者外来起源的主题相当普遍地见于许多文化之中,他往往具有拯救的力量。在建立王朝过程中,外来者和土著经常一起创造或利用部落神话制造一种强调自己崇高尊严的意识形态,以此赋与土地和族群神圣性。这在种族(ethnicity)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①我同意戈登关于神话在政权建立和种族形成过程中作用的观点,不过,要判断神话与宗教的关系,还是要分析神话内容本身。

《北史·突厥传》(《周书·突厥传》同)记载:“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阿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占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跋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都六即阿史那(可汗始祖)之父。所谓“兄弟七十人”是否暗示拜火教的圣七位一体(heptad)^②,夏神、冬神或即影指光明与黑暗二主^③,不得而知。无论如何,种类因火而得以存活,大儿因燃火而得奉为首领,突厥遂兴,这些情况不容忽视^④。如玛丽·博伊丝所说:“最重要的火为何被奉献给斗战神仍然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过,后来的婆罗钵经文表明,所有的火都被视作为神灵^⑤而战的斗士——不仅是在物质层面:抵抗黑暗与寒冷,而且也在精神层面:反对邪恶和愚昧。因而,把其中最伟大

① 戈登《突厥族群史导论》,120页。

② 玛丽·博伊丝《拜火教徒,其宗教信仰与习俗》(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21—22页。

③ 参见谢·亚·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72—374页。

④ 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228页。

⑤ spenta creation,此处当指拜火教的圣七位一体(heptad)及与之相联系的圣洁物,火、地、天、水等,参考玛丽·博伊丝《拜火教徒,其宗教信仰与习俗》,21—27页。